

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 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

河北正定篇

河北省正定县是习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1982年3月，他主动放弃北京优越条件，选择到基层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3年多时间里，他始终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以宽广战略眼光和求真务实精神，为百姓办实事、谋福祉，使正定这个历史厚重的冀中平原农业县赶上时代大潮，焕发出勃勃生机活力。

行遍滹沱河两岸的“二八”自行车

初到正定时，习近平同志将县委两三辆吉普车中的一辆吉普车让给老干部坐，把自己在北京用的一辆旧凤凰“二八”自行车托运过来。他经常穿着一身旧军装、军布鞋，斜背一个绿挎包，骑车在滹沱河两岸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向干部问生产，和村民拉家常，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收入和生活情况、

眼下最关心的事、对正定未来发展的建议，认真解决他们提出的实际问题。他一下到底，不打招呼，随走随停。正是骑着这辆自行车，他深入西兆通公社调研乡镇企业，指导玛钢厂提高技术和产量；跟三角村种棉能手学习棉花种植技术，向全县推广经验；在塔元庄村了解旧村改造，要求“一定要征求老百姓意见”……短短3年间，他骑车跑遍了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也留下了乡亲们对他经常扛着自行车跨越滹沱河南北岸的深情回忆。

“四轮到，追不到；两轮到，把话唠。”坐着小汽车、端着官架子，只能让群众敬而远之。脚撑一支，自行车一停，群众看得见人、听得清声，就愿意讲真话、诉真情。他把自行车骑到基层一线，让下基层、搞调研、寻问题、找办法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不仅摸清了县情、乡情、村情，也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为了更广泛了解真实民意、问计于民，他还把桌子摆上县城大集街头同群众促膝交谈，启动正定历史上第一次问卷调查，邀请大学生到县委座谈，敞开办公室门随时和群众谈心……“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正是扎实的调查研究，不好高骛远，不

脱离实际，让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施政干事有了最坚实的基础。

2023年5月，这辆锈迹斑斑、已无法自行站立的“二八”自行车经修复后移入了中央文物展柜，向观众述说着当年习近平同志勤跑基层、心系群众、真抓实干、造福人民的生动故事。

一心为民减征购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正定就成了河北第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高征购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先进县的重要条件，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把这个荣誉看得很重。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却很快发现，这个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粮食亩产超千斤，但每年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经常交完征购，剩下的就不够自己吃了，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每天只有4角钱。当时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村三角村，还有不少人到外县买薯干来维持生活，因为在本县买怕给“高产县”丢面子。面对这个“高产穷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及时纠正。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正定独有。但在荣

誉、“帽子”的束缚下，没人敢提出异议。习近平同志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心声，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他主动请缨，与其他县委领导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1982年夏，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对正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一致认为反映问题真实、要求合理。当年，正定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就核减了2800万斤。这一减，为调整全县农业结构减轻了压力，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彻底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

“口袋”要鼓起来，“脑袋”也要丰富起来。他反复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脏县”的帽子。他把精神文明建设做成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实在事”，组织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文明礼貌月”活动，举办正定全民运动会，建立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个村俱乐部，制定乡规民约，解决农村小学危房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改善办学条件等。正定县城环境大为改观，老百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两个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了两手抓、齐步走。2015年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地谈到，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因地制宜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改革开放后，正定“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的传统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商品生产”的全新形势。该“走什么路”、“如何起飞”，这是就任正定县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亟需解决的现实课题。为此，他连续几个月查古史、下基层，摸实情、剖典型，聚焦正定经济全方位梳理情况、找准症结，并与专家顾问团反复讨论，在此基础上以长远战略视野和全局眼光，因时就势、创造性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

“半城郊型”经济是一种介于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既依托于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城乡联系密切等优势，又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特点。通俗来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就生产什么”。正定向南距离石家庄市 15 公里，有 2 条铁路和 4 条公路相连，北方是广大的农村。习近平同志认为，这一发展路子既能抓住正定在交通、剩余劳动力、文化基础等方面毗邻省会的有利条件，以多种经营为城市服务；又能立足于农业高产

县的资源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实现“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1984年4月，正定县政府制定出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有正定特色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方案》，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作出具体部署。

“半城郊型”经济的精准定位使正定迅速转向“掏城市腰包”的商品生产。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针对生产附加值过低等问题，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拓宽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思路，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产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他多次强调不能丢掉传统农业县的长处，大力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1984年，全县经济实现“九翻”、“十超”：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9项指标比1980年翻一番，粮食总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10项指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真抓实干念好“人才经”

改革开放之初，百端待举，人才匮乏成为束缚地方发展的短板。习近平同志敏锐指出，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人才经”。他经过调研发现，制约正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缺乏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人才，致使产业结构失衡、发展动力不足。

他把人才问题作为振兴正定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重点，主持制定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即“人才九条”。“九条”内容充分体现“不拘一格博揽群才”的务实导向，不论身份、唯才是举、择其专长、量才使用，像利润提成、人事调动、细粮供应、农转非等政策都是实打实的破冰之举。

“有了战略目标就要有战略行动。”习近平同志为培养吸引人才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念好“人才经”：“内用”，组织开展三次知识分子普查，建起正定第一本“人才账”，充分合理使用本县人才；“外招”，成立人才技术开发公司和人才服务处，广招英才、筛选去留、妥善安置，两年间外引 680 多名各类人才；“上请”，向全国发出 100 多封“求贤信”，亲访面邀，聘请华罗庚、于光远等 50 多位专家组成正定顾问团；“下挖”，发现、培养和使用在商品生产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为他们清障拆卡，形成致富示范效应；“近补”，先后与全国 32 所学校、21 家科研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引进人才和项目，通过讲习进修、脱产培训等提升干部职工素质；“远育”，抓好正规教育、民间办学、选送代培，解决人才的未来之需。

招贤纳士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身先士卒，既做“有胆

有识的战略家”，又当“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为了争得爽脚粉项目落户正定，他连夜骑行数十里赶往石家庄，喊遍桥东区谈固小区几十栋家属楼，寻访项目持有人，投产不到一年，就赚得纯利润 30 多万元。为了挽救县油泵油嘴厂，他专程登门拜访、聘请无锡某公司原经理担任厂长，当年实现产值翻番。很多人才被他真心实意求贤若渴打动，在正定扎了根，“人才经”的引才聚才效应多年后仍持续释放。

勇开全省大包干先河

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呼唤敢闯敢拼的弄潮儿。习近平同志鲜明指出，“改革者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1982 年，凤阳小岗村被称为“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 3 年多，但由于“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推行大包干。调研中，他发现生产方式“大呼隆”、分配方式“大锅饭”、社员们“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常态，甚至几十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也很常见。从对党中央政策的深入理解中，从对正定农业发展的分析中，从群众意愿的反映中，他认定大包干是解放生产力的方向所在。

冒着“枪打出头鸟”的风险，在他大力推动下，县委县

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率先推出试点，这在全省全地区开了先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里双店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年收入由 210 元增加到 400 多元。这不仅震动全县，还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省内外参观者。1983 年 1 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 5 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1985 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 4.3 亿元，比 1982 年翻了近两番。

“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这种顶压力、冒风险的改革，习近平同志还推行了很多：开发河滩地搞多种经营、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实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乡镇机构改革……山西一位县委书记参观正定后感慨，“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针对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清晰而坚定：“我从不言必称改革，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

为正定古城留住根和魂

正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 1600 多年的建城史，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著称，被学界称

为“露天古建博物馆”。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忙完一天公务后，经常走访县城里的古寺古塔，什么地方有文物、保护情况如何，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渐渐发现，正定的文物保护状况堪忧，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县志里记载的“九楼四塔八大寺”只剩下隆兴寺和四个塔，当地一些群众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甚至把古城墙砖拆回家修房子、建厕所。他对文物损毁深感痛心，立即督促县城建局严格保护，让县文保所实地测量古城墙长度。为了提升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他提出开展一次全县文物大普查，制定文物现场保护规划，要求对县内每一处古建筑、古文物、古文化遗址划定保护范围，竖立明显的保护标志。自此，县里有了文物的明细账，拆砖拉土等行为逐渐消失。

“我们保护和修复文物，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凡有涉古城文物保护的事情，他都无一遗落地列入工作日程：筹款修复隆兴寺，妥善保护龙藏寺碑等古碑；推动全县古树普查保护，为县委大院古槐等古树设立护栏和标牌；修缮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牺牲地等革命遗址，推动纪念碑落成；主持编写《正定古今》并作序，让正定古城更好走

出去、传开来；力主修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带动旅游业发展等。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正定古城保护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2016年3月，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如今，不到10平方公里的正定古城有着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1棵挂牌的古树名木也全部得到保护。

狠抓党性党风党纪，制定县委六项规定

党风政风的状况、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直接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影响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习近平同志对正定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高度警惕，对相关问题剖析画像，指出，有的对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合乎我意的就办，不合意的就顶着不办，或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的革命精神不振，想的是位子、票子、房子、孩子，贪图生活安逸；有的是官僚主义，作风漂浮，不调查、不研究，工作拖拉、遇事推诿、不负责任，等

等。在 1983 年 4 月全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他明确要求，要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抓政治纪律，抓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四化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3 年 10 月，正定县新的县委领导班子在机构改革中产生，习近平同志任县委书记。他亲自主持制定《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经反复打磨、征求意见，12 月 6 日县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正式印发。一共六条内容，1200 余字，被称为“六项规定”，包括：（一）总揽全局，抓大事；（二）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三）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六）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六项规定”从抓作风建设入手，严肃党的纪律，强化党的意识，让全县干部对为政干什么、怎么干有了新的深刻认识。

作风建设需久久为功，更需抓细抓小。针对基层“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问题，他下大力气整治，1984 年 3 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扭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假大空的恶习；下决心搬‘文山’、填‘会海’，扭转单纯依靠会议和文件指导工作的作风，实行面对面领导。”县委、县政府印发关于改进文风会风的规定，“力度之大、措施之实，前所未有”。7月，在他的倡议下，全县开展了“效率月”活动，围绕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党政工作效率，重点抓“令行禁止、改进会风、简化手续、敢于碰硬”四项工作。“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气势不行。”经过坚决有力的一系列行动，正定各级党组织的形象改善了，广大群众投身四化建设的干劲热情提高了，县里各项事业呈现出积极向上势头。

福 建 篇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在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和省委、省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始终把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深入调查研究，探索推动一系列改革举措，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实事，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心血。这17年半的时光，深深印刻下他胸怀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

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

统筹全局，长远考虑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厦门经济特区1980年设立，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经济特区怎样发展、自由港怎么建，没有现成答案。当地干部形容：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习近平同志向市委、市政府提出，组织一班人对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进行研究，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指导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

1986年7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启动厦门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工作。他提出，我们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他还说，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他邀请中科院等有关方面专家，抽调精干力量，组建100多人的研究团队，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摸清厦门市情家底。《厦门日报》还发起“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征文活动，其中十多篇征文的意

见建议被吸纳进发展战略。

当时，对发展自由港这种自由贸易区，反对声音不在少数。习近平同志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他带课题组成员到新加坡考察，组织全国第一个关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国际研讨会，提出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香港的模式。在他的领导下，发展战略提出建设“自由港型经济特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

《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历时一年半时间编制出台，对经济建设、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精神文明建设、教育人才、民生保障等各方面作出全盘设计，开创了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纵跨15年发展战略的先河。30多年来，厦门接续奋斗，已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厦门自贸片区考察，深情地说：“我们在这里参与了创业，如今的发展，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还要好。”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

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宁德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经济总量排全省最末，俗称“闽东老九”。他到任后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用1个多月时间走遍了闽东9个县，思考如何带领老区人民摆脱贫困。

他在调研中发现，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宁德存在“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观念。宁德扶贫，先要扶志。他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说，在讲“贫穷”的同时，不要忘记讲闽东的光彩；在讲压力的同时，不要忘了讲动力。大家发展的热情和信心被迅速调动起来，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逐步在宁德人头脑中扎下根。

摆脱贫困，思想要解放，工作要扎实。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热切讨论修通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热门话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实现“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

化”。

对于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习近平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他认为，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要抓大农业，念“山海经”，立足于“土、农、特、外”发展乡镇企业；闽东工业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着眼于本地资源的加工利用，不能搞“无米之炊”。他还要求各县乡科学地选择主导产业，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这些思路举措符合当地实际，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万元，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是习近平同志为宁德发展开出一剂良方，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进取争先的志气、善作善成的恒心。在他打下的基础上，宁德靠苦干实干摘掉了贫困帽子，实现了全面小康。如今，宁德时代、上汽等大项目纷至沓来，宁德人终于抱上了期盼已久的“金娃娃”。

三上毛家坪

1988年，福安范坑乡毛家坪村是个特困村，山路崎

崎岖蜿蜒，村中饮用水都取自小水沟引入的地窖水，长期普遍存在人、禽、畜混居现象，胃肠病、皮肤病频发，文化、教育落后。1988年12月至1990年1月，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988年12月28日，习近平同志“一上毛家坪”，一到村里就入户探访，他掀开家中的锅盖看看锅中有没有油星，掀开蒸笼盖看群众吃什么饭，掀起床铺盖问群众睡得暖不暖。在得知离村子不到1公里处就有一处水源、却没钱修建水库后，他前往后山勘察，决定拨款2.6万元修建水库，又划拨3万元用于修建校舍、发展生产。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小学校舍，教师从1个增加到7个，还修建了库容2460立方米的饮用水水库，被村民亲切称为“思源水库”。

1989年10月26日，习近平同志“二上毛家坪”。他走进新建小学，拉开电灯开关，问老师电灯够不够亮、够不够用；在蓄水池旁，问提水的群众水干不干净、够不够吃。他向群众宣讲“四个不变”，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坚定了大家脱贫致富的信心决心。

1990年1月初，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陪同时任福建省委领导视察老区村建设情况并走访慰问老区群

众。了解到毛家坪群众想发展产业，他一直牵挂于心。不久后，他到福安坦洋村调研，建议坦洋村结对子帮扶毛家坪村，时任坦洋村村支书次日一早就派人送来茶苗。

除了传为美谈的“三上毛家坪”、“三进下党”，他还推动建立“四下基层”机制，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成为全省标杆。他用古语解释初衷：“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他始终心系革命老区、心系贫困群众，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 19 次到闽西，走远路、行险山、访至贫，看望慰问老红军和革命“五老”人员，瞻仰革命遗址，追寻革命足迹。“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坚定温暖的话语，深深印在老区人民心中。

“市民要住上像样的房子”

1990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当时，福州许多居民仍居住在由便宜的杉木板拼接而成的棚屋中。过去闽江洪水泛滥时，老百姓打开木门引水，洪水退去买些报纸再糊一次内墙，经年累月房子成了“纸糊的”，有了“纸褙福州城”的说法。习近平同志调查后认为，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大事，棚屋区改造，必

须提速，“市民要住上像样的房子”。

对为什么干这项工作，习近平同志态度明确：“旧城改造的目的不是地产开发，而是要安置好百姓，特别是贫困的百姓。”他提出，改造后的住宅要具备一定的标准，“千万不要再让老百姓在外面洗澡、拎着马桶出门了”；要“就地安置”，反对把老百姓迁走、让富裕人群搬进来的做法。福州根据总体规划和各方面承受能力，采取分期分段改造的办法，经济效益好的地段率先开发后，离繁华街道较远的成片木棚屋区还亟待改造。1993年8月，他在连片木棚屋改造初步实施方案上作出批示，要求积极进行改造。到1995年7月，福州市先后改造了400多片大小棚屋区，新建各类住宅800多万平方米，近40万居民乔迁新居。

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依然牵挂棚屋区老百姓。2000年7月2日，在中午最晒最热的时候，他率队察看上渡、帮洲、义洲等棚屋区，到苍霞详细询问居民生活情况。工作汇报会上他强调，我们的政府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将心比心，我们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钱用在急群众所需上。此后两天，福州市棚屋区拆迁安置优惠政策等3个文件

出台。8月底，苍霞社区动迁工作全部完成，10月，又启动改造仓山区上渡等地的棚屋区……多年来，福州市持续投入，让回迁群众生活更舒适。从“忧居”到“安居”再到“宜居”，“纸褙福州城”成了历史。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福州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干部作风散漫，办事效率难如人意，软硬环境都亟待改善。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下决心改进党政机关工作作风，1991年2月20日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提出“马上就办”，强调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实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当时，福州动物园存在经费缺乏、办公楼和动物园舍亟待修缮、饲养人员待遇较低等问题，习近平同志曾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但拖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反馈。半年后，又有报告反映同一问题，他立即作出严肃批示：这件事距市领导批示竟已过了半年，而依然故我，毫无改变。连一个回音也没有。这与“马上就办”的精神相去何远？俱往矣，从今天开始一周内办结。他还要求对从

前石沉大海的批办件进行清理，锲而不舍地要查办结果。作风一变效率增，动物园的问题五天时间就落实解决了。有同志感慨，“从这件事起，干部们就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狠抓落实，转变作风了”。

1992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六届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去年我们提倡“马上就办”，取得很好效果。我想今年除了这四个字外，还要再加四个字，就是“真抓实干”。“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这八个大字被镌刻在福州市委礼堂的外墙上，成为工作目标、制度约束。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并不意味着可以枉顾原则、违背政策、乱干蛮干。1992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一个政策咨询调研会议，有同志讲了当时流行的“红灯论”，即“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只要没有严重违反原则，就可以大干快上。对此，他严肃指出，我们不能搞这种“红灯论”，我们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地区发展速度，愿望都是好的，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希望大家不仅要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要弄清楚“允许干什么”、“应当怎么干”。他的话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的真抓实干，才真正有利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真正造福人民群众。

保护三坊七巷、守护历史文脉是“重要责任”

福州三坊七巷保存有 200 余座古建筑，被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明清建筑博物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化浪潮中，只顾眼前利益、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一度盛行，三坊七巷曾面临建筑被拆毁、风貌遭破坏的危险。1990 年，习近平同志收到福州市一名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市有关部门批准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位于三坊七巷的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用于建设商品房。他当即作出批示叫停拆迁，要求有关部门核实情况。

1991 年 3 月，他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指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们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林觉民故居由此得以保存并得到保护性修缮，当年 11 月辟为福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后来，他又亲自过问林则徐故居、邓拓故居、林森故居等保护修复工作，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为防止其他老建筑被“一拆了之”，习近平同志要求对

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名人故居、遗址采取多种形式挂牌，并一律建立档案。福州市为第一批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搪瓷烧制的专有铭牌，修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还制定了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给《福州古厝》作序，序中写道：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坊七巷的保护始终牵挂。2021年福州考察期间，他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2024年，了解到三坊七巷一些古建筑未按规定对外开放、成为少数人高档消费场所，他又作出重要批示，推动立即整改。如今，三坊七巷遵循“修旧如旧，保持总体坊巷格局、风格、风貌不变”的原则，已成为富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人文氛围的“城市会客厅”。

推动“晋江经验”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泉州晋江兴起开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销往全国乃至海外，成为福建县域经济的代表。有关专家将这一发展路子概括为“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齐名。

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省长的6年里，习近平同志7次到晋江调研。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入世、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背景下，他始终都在思考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2002年6月，他到泉州进行专题调研，专门把讲话稿中的“晋江模式”改成“晋江经验”。理由是：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经验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从“模式”到“经验”，两字之差，折射的是发展眼光和紧迫意识。

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的产业发展与苏南、温州相比，在改革创新力度和规范化程度、大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和产业水平、城镇化发展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他敏锐指出，“客观、冷静地审视‘晋江经验’的优长和不足，有利于我们在新世纪中扬长避短、博采

众长，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使之与时俱进、长盛不衰。”对于“晋江经验”不断创新和发展，他提出要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等五个关系，富有前瞻性地为晋江发展迭代升级“开方抓药”。

他十分关注晋江企业的科技创新，调研企业时不但看车间、还看化验室，并跟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在一次鞋业博览会上他对安踏公司负责人提出3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他高度重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强调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错位”或“不到位”。在他的指导推动下，晋江始终保持着顽强生命力和锐意创新精神。现在，这座闽南小城拥有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6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直到今天，“晋江经验”还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

以焦裕禄、谷文昌为楷模

焦裕禄、谷文昌都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在兰考县抗风沙、治盐碱、除内涝，为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民立下愚公移山志，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绿洲，当地百姓逢年过节“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但以他们为楷模自勉自励，而且号召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为政为人。

在宁德工作时，他就以焦裕禄为典型，激励干部不怕苦、不畏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90年7月15日，刚到福州不久、深夜工作的他读了人民日报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深受感动，当即填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下“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词句。这首词次日在《福州晚报》发表，引发热烈反响。

谷文昌作为福建涌现出的优秀党员干部，习近平同志深受他的事迹触动，经常和大家讲当年遍植木麻黄、奋战谷满仓的故事。在东山县谷文昌陵园，他语重心长：谷文昌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回答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干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在调研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时，他嘱咐当地干部：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清山秀的优美环境里，还要继续发扬谷

文昌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抓下去。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对于坚持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不但有心目中的楷模标杆，而且有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1990年，他曾接受福建省领导科学研究会约稿，写成一篇文章《从政杂谈》，系统阐述对青年干部为官任事、创造业绩的认识。文章开头就提出“芝麻官”千钧担，“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随后提出青年干部“四忌”：忌急于求成、忌自以为是、忌朝令夕改、忌眼高手低；继而阐发为官“四要”：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深入总结选用人才“知、举、用、待、育”五法；最后提出要加强领导者的修养，有党性观念、有度量、有气节、要诚实、有气魄，“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是靠面壁坐禅获得”、“修行靠实践，功到自然成”。这些心得体悟，至今仍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浙 江 篇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和省委书记（2002年11月起）。在浙江既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重要时期，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求实创新，大力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谋划实施“八八战略”，带领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对正确政绩观的提倡和弘扬，写在一篇篇“哲欣”署名文章中，写在蓬勃日新的之江大地上。

“十月怀胎”的“八八战略”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履新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位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请他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后书记、省长“一肩挑”的习近平同志，开始了紧张密集的调研活动。短短两个多月里，他到市、县（市、区）和省直部门调研的时间超过50%。为了争取更多时间调查研究，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周末也多是扎在基层。12月在温州与基层干部座谈时，当地领导请他“作重要指示”。他说：“我到浙江工作时间不长，哪有这么多重要指示？目前到各地考察主要是熟悉情况，了解浙江。”他只用两个多月时

间就走遍了浙江 11 个地级市。

2003 年 2 月 10 日，农历大年初十，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调查研究为主题进行学习。习近平同志开宗明义指出：“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怎么开局，我们选了调查研究这个形式，从转变作风入手，解决全局性的重点问题。”他还说，要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能蹲在机关里，而要深入基层调研，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2003 年，被浙江省委确定为“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

经过马不停蹄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证，习近平同志在 2003 年 7 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系统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的“八八战略”，为新形势下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量体裁衣、定纲指向。“八八战略”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发展规律，既立足浙江之“实”，又探求发展之“是”，极具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成为引领浙江省域长远发展的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

工作靠实，事业靠干

“八八战略”提出后，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五次全会，将 2004 年确定为围绕“八八战略”主线推进浙江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狠抓落实年”。2004年1月29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新年第一次专题学习，主题就是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会上，习近平同志与大家分享了春节期间撰写的四副春联，“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系真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四副对联横批均为“求真务实”。这次会议，向全省干部发出了崇实干、出实招、求实效的强烈信号。

200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又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抓而不实，等于白抓》，强调“抓好落实，我们的事业就能充满生机；不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一次他到某县调研，县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自顾自大谈特谈各种成绩。习近平同志打断他：“请你谈一谈县里落实省委‘八八战略’的情况。”县委书记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习近平同志严肃指出：“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既要有布置，又要有检查，形成真抓实干、令行禁止这样一个局面。”

实干者须先务实，发展“地瓜经济”就是浙江求真务实

谋发展的生动案例。作为一个陆域面积只有 10 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又相对匮乏的省份，浙江发展空间受到诸多限制。当时，对于浙商要不要走出去有不同看法，有人担心这样会造成浙江经济“空心化”。对此，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研思考，明确主张应考虑浙江实际情况鼓励企业走出去，他形象地比喻：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如今，浙商足迹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成为“中国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作靠实，事业靠干”、“政绩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出来的”、“出政绩须讲求科学，尊重规律”……翻开《之江新语》，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20 多年来，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张蓝图绘到底，之江大地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

将西湖“还湖于民”

西湖是杭州风景名胜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然而，由于保护不力和人为因素，21世纪初的西湖水域萎缩、水质恶化、景观残缺、公共空间被占，整体风貌“湖山割裂，明珠蒙尘”。

2002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考察杭州第一站就来到西湖，当时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刚启动不久，何去何从尚有不小争议。站在杨公堤景区建设现场，他仔细察看规划图纸，指出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的“灵魂”，西湖是杭州的“生命线”，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西湖西进”一锤定音。此后不到一年时间，他三次调研西湖，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定下“32字”原则：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传承历史、突出文化，以民为本、还湖于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随着工程顺利推进，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逐步恢复，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凸显。西湖围栏一并拆除，环湖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人民的西湖还给了人民。2011年6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生命安全是群众安危所系。浙江作为沿海地区，每年都要经历数场台风，传统的“抗”台思维导致常有人员伤

亡。习近平同志到任后，确立了“以人为本”的防台理念、“生命至上”的防台宗旨，提出“不伤人、少伤人”的目标要求，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从根本上重塑了浙江的应对台风策略和措施。2005年，为防御“麦莎”台风，浙江提前转移1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有力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

还湖于民、由“抗”到“防”的背后，是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心无百姓莫为‘官’”、“凡是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这些话朴实无华却铿锵有力，是他志向心迹的流露，是对浙江党员干部的激励感召。

凤凰涅槃，腾笼换鸟

21世纪初，我国沿海省份经济发展迅速，广东、江苏、山东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前三，浙江紧随其后，“浙江要加速追上去”的言论不绝于耳。但当时的浙江既存在资源要素匮乏等“先天的不足”，也面临着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电力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成长的烦恼”。

面对这样的局面，习近平同志对做好经济工作有着独到看法：“我们不要跟人家拼增长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下大功夫。”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他下决心推进浙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尽管这会令经济增长承压，但他坚定主张“不能因为 GDP 掉了一点，就乱了方寸，不能只顾一时的数据，要谋长远发展”。为推动深层次转方式、调结构，他打了个比方——养好“两只鸟”。

一个是“凤凰涅槃”，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淘汰粗放、低端、污染的落后产能，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当时浙江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凤凰涅槃’靠什么？靠自主创新，包括自主技术的创新、自主品牌的创新”。为此，浙江大力推进科技强省和“数字浙江”建设，依靠先进技术加快经济发展，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涌现一大批科技公司。2025年火爆出圈的“杭州六小龙”，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根植于浙江长期以来培育形成的创新沃土。

一个是“腾笼换鸟”，他认为，“如果因为资源条件受到约束，就索性‘鸟去笼空’，是不可取的”，应该在推动浙江企业积极参与全国区域合作交流的同时，大力引进优质的内外资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后来，尽管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中美经贸摩擦等影响，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保持稳健，这得益于浙江的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起步早、行动快、力度大。

围绕一个中心，共发一个声音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反复强调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各项工作都要围绕一个主旋律、一个中心来进行，共发一个声音。一次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有位同志讲到，当前浙江经济增速趋缓的一个因素，是执行中央一些政策过于死板。他听后，态度鲜明而又循循善诱地说，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不存在死板与灵活的问题，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应当坚决贯彻而且不折不扣；我们要眼睛向内，寻找自身原因，研究应对措施，这才是地方党委和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纪律。

2004年8月，习近平同志就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落实情况到绍兴调研，指出：“省委的决策是中央方针、政策在浙江的具体化，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应坚决贯彻落实。”“如果对中央的大政方针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作‘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

这次会上，他详细谈到抓落实的心得：贯彻落实上级决策有一个过程，第一步是有响应比没响应好，第二步是不要形成“雷声大雨点小”或形式上的回应，关键还要看是否真抓实干了；对下面的同志，对各级党组织抓落实，要听其言、观其行；抓落实不能满足于会议部署，要督查、反馈以及开一些经验交流会，总结、再总结，部署、再部署，经过几个回合、几个过程，才能把一件事贯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规律。在他眼中，抓落实要听言、更要见行，有一套方法、更有其规律，最终的着眼点落脚点，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干部要善于“瞻前顾后”

浙江是美术大省，建一座浙江的美术馆，曾是几代人的梦想。几经波折后，2002年，筹建浙江省美术馆的建议终于被提上日程，但前期工作却遇到了一连串棘手

问题，不少同志担心“这事恐怕要黄了”。2002年11月下旬，刚任省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示：“新官要理旧事。”纵使这件旧事难度很大，面临选址存在争议、同部队协调建设用地、资金不足等问题，他仍知难而上，明确要求“接过接力棒接着干，把这个事情下决心干好”。2003年1月31日，正值除夕，他来到西湖边南山路踏勘美术馆选址情况，随即在就近的柳莺宾馆主持召开会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他果断拍板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建筑风格采取“中国的样式”，对扫清工作障碍一一部署。2005年5月，西子湖畔，玉皇山麓，他亲自按下开工按钮，依山向湖的浙江美术馆拉开建设大幕。

对如何一棒接着一棒干、持之以恒以成其功，习近平同志始终保持关注和思考。他指出，“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功成不必在我，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这不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风格”“切忌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后人留财富”“千万不要‘空前绝后’，出现‘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

为浙江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的，还有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的“五大百亿”工程，即“百亿基础设施建设”、“百亿信息化建设”、“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百亿生态环境建设”、“百亿帮扶致富建设”五项工程。他突出强调，实施中一定要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把这些工程建成惠泽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五大百亿”工程立足当下、着眼长远，解决了不少事关浙江长远发展的硬基础和软环境问题。现在浙江的很多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机场，电力和能源设施，水利设施，移动通信网络，医疗保障体系，杭州、宁波、温州高教园区等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就是在那段时间启动建设的。生态环境的好转和城乡区域差距的缩小，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工程的实施，使浙江在发展长跑中动力满满、后劲十足。

既要 GDP，又要绿色 GDP

安吉，取自《诗经》中的“安且吉兮”。就是在这里，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使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县城真正成了广为人知“安且吉兮”的美好之地。

安吉有个名叫余村的小山村，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致富，依靠山上优质石灰岩自办水泥厂，终日响彻开矿炮声和机器轰鸣。村民虽然富了，村里却溪流浑浊、烟尘漫天。2003年，余村下决心关停三座石矿、一家水泥厂，村集体经济和百姓收入立刻下滑。“你们关矿停厂，是高明之举！”2005年8月，到余村考察的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身，它有含金量”。时任的安吉县委书记后来回忆道：“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振奋，也很受鼓舞。因为在GDP至上的年代，GDP考核是领导干部的主要政绩。政绩上不去，实际上就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省委书记能这样讲，他在肯定了我们做法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释放我们的压力。”2006年6月，安吉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随着来此感受绿水青山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次，习近平同志去某地调研，到了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工业园区，发现这里都是周边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当地领导却引以为豪、侃侃而谈。他马上变了脸色，严厉地对当地领导说：“要抓住自身的定位，把这里的绿水青山保护好，才是你最大的政绩。”一席话，

让当地领导满脸通红，也让在场的干部对“什么是政绩”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浙江自 2003 年起推进生态省建设，由他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以十大重点领域、五大保障体系为“四梁八柱”，全面推进“绿色浙江”建设，推动浙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

2005 年 7 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其中之一是文化研究工程。为了实施好这项需要下苦功、花长劲的工程，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在后来工程出版的《成果文库》中，他这样讲述自己的考虑：“文化建设是一项不容易出‘政绩’的基础工程，文化工作是一项相对务‘虚’的工作。文化建设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而不是急功近利，需要的是一砖一瓦的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而不是立竿见影和轰动效应。”他用实际行动，树起了埋头苦干推进文化建设的“风向标”。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的美誉。21 世纪初，一些领导

干部认为经济建设是硬任务，而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抓得再紧也显不出成绩，甚至为了城市开发破坏文化遗产。对此，习近平同志鲜明指出，“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在他亲自关心下，良渚遗址、跨湖桥遗址、大运河浙江段、绍兴仓桥直街等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作为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宋画全集》编纂于2005年立项，历经17年接续努力，拓展成为64卷244册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在抓文化建设、抓文化遗产保护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显绩和潜绩的深刻思考。他在一篇名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指出，“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立起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

为给浙江发展把准方向、纠正偏差，习近平同志反复提醒浙江各级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在政绩观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2004年9月7日，他在浙江省委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以“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题发表讲话，鲜明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重始轻终”“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五方面问题，深入分析了造成“五重五轻”现象的根源，认为其“与我们现在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工作还不科学、不全面、不完善有关”。

政绩考核关键要解决“考核什么”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同样也是政绩”。讲话解放思想、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为全省干部树立起全面、综合、整体的政绩导向，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唯GDP”片面政绩观。

2006年7月，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办法》的一大创新是增加“实绩分析”考核项目，

其中 15 个定量指标既包括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率、环境质量等社会发展指标；既考察经济增长的规模、幅度，也考察万元 GDP 建设用地增量、万元 GDP 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地方政府负债率等涉及发展成本代价的指标。这是浙江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抓什么工作、用什么样的人树立起鲜明导向。

2008 年 10 月，已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同志回到浙江考察，得知浙江在搞干部双推双考（即县委书记通过参加考试竞聘副厅长），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县委书记管着几十万、上百万人，党政军民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样样都在抓，有没有政绩都在那里摆着，还需要通过考试来看谁干得好吗？这番话掷地有声，为考准考实干部政绩提供了正确指引。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党校 2004 年秋季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编

一、充分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领导干部来说，政绩是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反映，是组织和群众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领导班子来说，政绩是领导能力的整体展示，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着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有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目标追求，进一步提高加强学习、提高本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名誉，从思想上筑牢坚固的防线，为克服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思想和行为奠定重要的认识论基础；才能坚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努力创造出人民满意、群众高兴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一些领导干部在树立正确政绩观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不仅造成人财物和宝贵时间的浪费，而且严重腐蚀干部队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对此，我们一定要

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

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政绩。一方面，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总量增长，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主观努力，又要看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不但要看政绩收益，而且要看政绩成本。比如，在城市、开发区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是否把握分寸，切实兼顾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妥善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征地和拆迁中的矛盾和问题；又如，在推进发展和建设中，是否量力而行，把政府借贷控制在合理有度的范围内，会不会寅吃卯粮，产生自己出成果、后人吃苦果的问题；再如，经济指标上去了，是否对环境、资源等产生破坏或掠夺，造成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恶果等。

坚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真正的政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风吹不掉，雨淋不坏，没有水分，没有后遗症，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要创造这样的政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行，没有长期的艰苦奋斗不行，没有不图名、不求利的思想境界也不行。要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盲目攀比；要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善于把握规律性、提高科学性、减少盲目性、防止片面性；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把创造政绩的立足点放在真抓实干上。

坚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要高度关注民生，心系困难群众，多办一批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得民心的好事、难事和实事。要牢固树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衡量领导干部的政绩，最根本的是要看广大群众是否认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我们常讲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千重要、万重要不如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最重要，就是这个道理。

三、牢固树立和悉心实践正确政绩观的基本要求

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牢牢把

握世界观这个“总开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切实用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引领个人的发展和进步，把看待政绩的定位放在推进党和人民事业上，把创造政绩的方式放在正确运用权力上。

坚持积极进取与科学态度相结合，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领导干部追求和创造政绩的实践，应该是符合实际、遵循规律的实践。为此，必须学会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努力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上下功夫，真正把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贯注于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发展的领导工作实践中，真正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

四、努力为树立和实践正确政绩观提供有效的教育引导和保证监督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靠各级领导干部认识端正、自觉实践，又要靠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教育、管理和引导。

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促使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一是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不能片面

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其他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不能唯数字，更不能搞“数字游戏”，要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的发生。四是考核指标既要有确定性，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又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五是在考核方法上，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集中考核与经常性考核相结合，特别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党组织的考核与群众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要坚持凭实绩用干部，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大力选拔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发展上有成效的干部，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那些作风优良、实绩突出的干部。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更不能亏待；对当时被认为有政绩，但被实践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

来。

要建立健全有关奖惩制度，激励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对政绩突出的优秀领导干部，要大张旗鼓地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政绩和政绩观方面出现问题的干部，该批评教育的要批评教育，该处理的要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要健全有关监督约束机制，保证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对领导班子决策的内部监督。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组织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提高监督的实效性。上级党委要通过巡视、检查、调研、听取汇报等方式，及时发现下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政绩观方面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提醒和纠正，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要抓好深化理论武装工作，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对待政绩的态度。要围绕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

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加强以胜任本职工作为目标的能力素质培养，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本领。

上 海 篇

2007年3月至10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面对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上海，在短短七个月时间里，他走遍全市当年的19个区县，立足新形势，明确新使命，创造新作为，抓党建、凝共识，抓发展、聚人气，短时间内让干部群众精神为之一振，使上海城市面貌为之一新，生动展现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韧不拔的担当精神和从严管党治党的坚定态度。

“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

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后，最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两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换届的大会。他一到上海，就要求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尽快拿出初稿。初稿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马上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然后对起草组提出明确的修改要求。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提

出对报告作两处大的改动。一是对报告的初稿框架作了调整，明确要求起草党代会报告、谋划上海未来发展，必须着眼“四个放在”，即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二是在报告修改过程中，特别强调讲政治和加强党的领导。

讲政治和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5月28日，市第九次党代会闭幕当天，习近平同志带领新一届市委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发表讲话说，我们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上海的畅通。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反复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和行动”，上海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

曾有一段时间，上海由于地域面积较小，又都是平原地区，央视信号已全域覆盖，东方卫视便没有转播央视《新闻联播》。习近平同志知道此事后，专门把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找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提出明确要求：“东方卫视必须转！”在此后的一次专题会上，习近平同志

非常严肃地再次强调，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而是代表中央的声音。此后，东方卫视每天晚上7点同步转播《新闻联播》。

在与中央保持一致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习近平同志不仅从大处着眼，同时也非常注重一些细节。上海当年提出“社会主义新郊区建设”，与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并不完全一致。他注意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上海农村虽然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工作中也可以有自己从实际出发的做法，但大的口号、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能另搞一套。从此，上海不再使用“新郊区”的提法。

“发扬钉钉子精神抓落实”

习近平同志十分注重抓工作落实，常说“看准了，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他非常重视督查工作，在上海工作时把党组织关系放在了市委督查室。2007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到市委督查室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他指出，任何工作，如果光有决策没有落实，都只是一句口号，必须重视抓落实，重视发挥督查在抓落实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通过督促检查，推动中央和市委的重要决策落到实处；要抓好批

示落实，起到小中见大、见微知著、推动全局工作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每月听取督查工作情况汇报，对市委办公厅《督查专报》和《批示落实情况》中反馈的内容看得很仔细，分别用红笔、黑笔作区分标记，有时还作出批示。根据市委督查室2007年8月3日一项《关于近期习近平同志批示督促落实情况汇报》统计，从2007年6月下旬至8月2日，市委督查室共收到习近平同志批示37件，已反馈落实22件，正在办理15件。而那些正在办理的批示件，也在一个月內全部办结。除了作批示，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具体落实情况，经常了解各项工作落实得怎么样。对他提出的要求、作出的重要批示，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督查室一般当天反馈落实情况，其他重要事项一般一周內作初步反馈。

为压实责任，市委督查室还把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全部分解到具体部门，明确推进节点，按季度全面汇总工作进展情况。同时，围绕工作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开展督查调研，访谈相关负责人和具体责任人员，了解不能落实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供市委领导决策的参考建议，积极发挥督导作用，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

“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

经过连续 15 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2007 年的上海正遭遇资源环境瓶颈、体制机制障碍、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处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当时上海提出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即完成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大调整。

必须调是各方共识，怎么调却众说纷纭。习近平同志广泛考察各行各业，深入调研，悉心谋划，从全局高度，探索上海面向未来的发展新路。每到一处，他既从实际出发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又注重统一思想，推动党员干部发展理念的转变。在 2007 年 8 月到市国资委调研时强调，三个产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是在市场经济、现有产业发展的实际状态下的一种发展过程，不是人为地去遏制二产的发展，来造成三产的独大。

对第二产业，习近平同志态度鲜明：上海长期以来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不要把它当作包袱，而应当作财富。在调研上海各大产业基地后，他敏锐指出，“上海的二产正在结构调整中孕育新的发展”。他十分重视“上海制造”，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着力提高先进制造业竞争力，

继续发挥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

对第三产业发展，他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破题，指出在“四个中心”中，金融中心处于核心地位。还多次提醒，必须严加防范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他还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专门分析股市、楼市情况，指出“虚拟经济也是双刃剑”，要积极培育、认真引导、大力促进。

对 GDP 占比不到 1% 的农业，他也高度关注，多次强调把比重小的上海农业始终放在大战略和全局上谋划，指出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农业发展不但不能忽视，而且要紧密结合实际，注重发展精细化、现代化农业。

习近平同志专门召开产业发展专题调研会，结合前期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提出上海“三个产业要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实践证明，融合发展的先进理念，对上海整个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

长期以来，“手拎马桶”是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一道独特风景。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人多、旧城区多、居住面积小，大部分石库门建筑在建造之初就没有专门设计卫生

间，只能以倒马桶的方式解决如厕问题。这些民生难题，是上海人生活中的痛点，也成为习近平同志的关注焦点。他恳切地说：“基层百姓有几个真正关心 GDP 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每年有增收，是不是在社保方面有改善，跟他们息息相关的利益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他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

在基层调研时，“旧区改造”是他经常提及的热词。6月在黄浦区，他对石库门旧式里弄群众的伙食、起居、厨房乃至马桶等问题详细询问，强调“旧区改造一定要坚持推进，不能让老百姓再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生活下去了”。8月在闸北区，他专门了解旧房改造情况，并到居民家中仔细察看经过成套改造后的独用厨房和卫生间，强调旧区改造要稳步推进，把需求和可能结合起来，逐步改善群众的居住质量。9月在普陀区，他又特意叮嘱，推进旧区改造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层次、多渠道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持续深入推进。2020年8月，对旧城改造一直牵挂于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城市开发建设早、旧城区多，改造任务很重，这件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此时，上海“不能拎着马桶走向现代化”民生实事攻坚战进入关键阶段。2022年，随着全市成片旧改任务的完成，上海集中成片的“拎马桶”问题基本解决。2025年，又经过两年多的攻坚拔点，上海人民终于彻底告别“拎马桶”。

“群众有什么好怕的”

2007年正值上海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也是群众信访的高发期。当时，动拆迁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分配问题，林林总总，样样都是难题。一次，习近平同志到闸北区调研，有群众得知后写了一封信，在路边等着，试图直接把信递给他。警卫人员见状就把这名群众挡在外面，习近平同志当场叫住有关人员：“你们干嘛要这样，他是要送一封信给我。”当场就把信收了下來，还对上访的群众说：“信我收到了，回去会认真看的。”

在9月5日的市信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信访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能够办得到的要马上办；一时办不到的，要和群众及时说清楚，并积极创造条件

争取早日解决；对于群众暂时不理解、不配合甚至出现过激情绪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劝导工作，用真心真情赢得群众信任。他还提出领导干部要下访，并且决定带头接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有顾虑，一是怕个别上访户胡搅蛮缠，二是怕把基层的事引到市里来，不太愿意下访。对此，习近平同志十分坚决：“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既要‘挂帅’，又要‘亲征’”“往矛盾堆里走，到问题堆里去”“群众有什么好怕的？共产党什么时候会怕群众啊？”

9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杨浦区信访办亲自接待五批信访群众，内容涉及城建、物业管理和菜场等方面。其中五角场街道某社区的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因施工时基坑挖得太深，造成地基下沉，周边500多户居民房屋屋顶和墙体开裂、漏水。各方先后开60多次协调会，但在赔偿标准上始终谈不拢。习近平同志了解情况后，当场提出几条意见：一是开发建设中对开发商要有约束，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受损；二是开发建设前对老百姓合法权益的影响要有评估；三是赔偿标准要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评估。随后杨浦区成立专门工作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信访问题上，习近平同志重视

抓落实，更重视建制度。在上海工作时间不长，他却把各级领导干部每周接访和目标考核两项制度扎实建立起来，有力遏制了信访不断上升的势头。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解决生态问题

当时，上海常住人口接近 2000 万，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实现产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上海郊区的崇明、青浦两地怎么定位、怎么发展，是一项不小的课题。作为中国第三大岛的崇明，是上海的绿肺；青浦则拥有上海最大的淡水湖——淀山湖。其时，崇明盼望多年的长江隧桥工程正加紧施工，不时能听到一些议论：以前崇明要坐船来回，没条件发展工业，等隧桥通了以后，何不多吸引一些工厂到岛上来？多年来青浦也为保护水资源作出一定的牺牲，有些人认为这样那样的限制，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收入。

4 月 12 日，履新才半个多月的习近平同志拿出一整天时间，实地调研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崇明生态岛建设。他对一起调研的同志说：“这一路走来，我对崇明岛有了深刻的印象，崇明的发展理念很好。要按照建设生态岛的思路，认认真真做下去，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不要动摇。”他提出要把水清、气洁、林茂、土净、环境宜人，

作为崇明的发展目标，强调要正确处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加快构筑现代生态型产业体系。

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前往青浦调研，他一锤定音，明确指出对发展中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切不能因为一时的发展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在当天的调研座谈会上，他开门见山谈环境：“当人们连喝自来水都遇到了麻烦，这样搞出来的GDP到底有多大的用场？”“真正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实际举措，否则都是说空话。”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把环保和生态治理放在重要的位置。

这些年来，上海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从未动摇。2010年，上海市政府制定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明确将生态岛建设升级为现代化生态岛。201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将崇明建设为世界级生态岛。2019年，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青浦开启了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篇章。

“综合实力反映在文化上”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习近平同志2007年5月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对上海城

市精神新的提炼和概括。他鲜明指出，如果说海纳百川是上海一贯的文化特点，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种文化本质，那么开明睿智是一种态度，大气谦和是一种胸襟，这样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进一步追求卓越。九次党代会第一次把建设文化大都市写进报告，指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是提升大城市软实力的客观要求。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强调建设国际大都市，综合实力反映在文化上，上海要形成有特点的、有优越性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效益。2007年5月9日，他到上海交通大学调研时指出：“文化之于经济发展，何其重要。对上海来说，之所以能有经济中心城市的表现，魂与根来自文化。”8月20日，他专程参观上海书展，强调要认真打造好上海书展这张文化名片，成为服务全国的文化大平台，增强上海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1日他到上海京剧院调研，欣喜得知该院创作和排演的《廉吏于成龙》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并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指出“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在经济发展中推进文化发展”。

2018年11月，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又概括提出上海具有“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2021年6月，上海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软实力的内核，正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提炼概括的16字上海城市精神和6字上海城市品格。“上海文化”越来越成为上海立足黄浦江畔、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舞台的闪亮名片。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的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与实践，深刻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问题的重视、对正确政绩观的强调，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如一。深刻感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创事业的真挚情怀一以贯之，讲政治重党性、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高度自觉一以贯之，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唯物主义立场一以贯之，胸怀全局、放眼长远的战略眼光一以贯之，因时而变、因势而进的发展思路一以贯之，锐意进取、改革当先的创新精神一以贯之，真抓实干、不负所托的责任担当一以贯之，甘做铺路石、功成不必在我的奉献品格一以贯之。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

育中，应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有关思想理念和生动实践的梳理、挖掘、宣传，以喜闻乐见、入脑入心的方式，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